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列子全译

(修订版)

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工程奖

王强模
译注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列子全译

(修订版)

王强模 译注

(现代图书馆藏)

全译本 列子 王强模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列子全译/王强模译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12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ISBN 978-7-221-08387-6

I. 列… II. 王… III. ①道家②列子-译文 IV. B223.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0209 号

书 名 列子全译

译 注 王强模

责任编辑 袁华忠

特约编辑 程亦赤

装帧设计 余强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字 数 219 千字

印 张 15

定 价 22.50 元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第一版)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运熙	余冠英	张克(常务)
罗尔纲	程千帆	缪钺

再版说明

出版的境界是：为饥作浆，为旱作润，为冥作光，为往圣继绝学。《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担当这一历史的重托，挟着春风走到了学人和国学爱好者的面前。

书似青山常乱叠，眼光如炬淘金来。《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推出，即以权威、精到、普及的面貌风靡整个书界。本套丛书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但多年断档，令人怀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名著全译，多以三五本的规模推出，而今天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出手尽显大家气度，一次集中推出五十种，满足眼睛与心灵的饕餮。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浩如烟海的历代名著，就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字不仅记录了中国古代各个方面的历史与人文，物质与精神，成为后来人的精神家园，而且对中华民族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但古人留下的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当下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且以往坊间的不少古籍今译的读物，大都难尽人意：

——选译本。如《国语选译》《诗经选译》等。了解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人知道，“选”是一种评论的方式。鲁迅先生曾指出，如果对陶渊明只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不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类“金刚怒目”式的作品，那就很难使读者对陶渊明的“全人”有完整的认识，若“再加抑扬”，就“更离真实”了。所以说选译本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白话本。如《白话史记》《白话搜神记》之类。这类今译本有的置原文于不顾，随意增删敷衍，从严格意义上已不是原书；有的译文尚称严谨，但无原文对照核查，欲引用古人文句还要另觅原书，难称

人意。

——单译本。这类书最多,译文之外附有原文、注释,其中也不乏质量较高者。遗憾的是见木不见林,缺乏学术系统性,读者买到一本算一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很难达到全面。

本丛书在策划之初就考虑到避免以上各种译本之不足,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融译注为一炉,俾使社会各界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之完整原貌,有利于当下人文精神建设,又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译介,乃延聘海内学界通人,精选史有定评之夏商迄晚清经史子集四部,以全注全译形式重新装帧、重新校勘整理出版。所选各书前言对该名著之时代、作者、内容、成就、文献版本皆有详赡说明,各篇各卷前有简明扼要的题解,原文选用业经整理的善本,注释采用学术界公认的成果,译文强调忠实原文、通达流畅。

书行天下,道亦随之,既有品味,又有普及,为大家营造出一片文化底蕴深厚、知识境界广博、思想空间深邃的精神沃土,是《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的孜孜追求。此次修订是在前辈学人呕心沥血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认真的审读和勘校,是在“国学热”基础上的一次新的提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亦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今日重现书界,必将旋起一种新的阅读风暴。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形成当代的人文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在现代化人文化的进程中对开启今人智慧、滋养今人心灵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经典不腐更不朽,它是源远流长的活水,天光云影,亘古永在。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年9月

前言

《列子》是一部奇书。

它之奇，一是不明作者，甚至有人根本怀疑有无列子其人。说此书为列子本人所撰者有之，说此书为秦汉时老庄之徒所撰者有之，说此书为汉代人、为魏晋人假托列子之名而撰者有之，说此书就是作注者张湛所伪造者有之。二是内容较为驳杂。有人认为它倾向于道家，有人认为它思想颓废、放纵情欲，有人认为它对黑暗丑恶的社会进行了抨击，有人则认为它思想体系混乱，诡谲荒诞。三是寓言故事特别多，全书有寓言故事 102 个，这在诸子中是少见的。

下面谈谈对这部书的一些看法。

列子考略

列子其人究竟有无，是“列学”争论的一个焦点。

怀疑列子是虚构的人物，有下列三条主要根据：

其一，列子既然活跃在春秋末战国初，学术上为道家流派，显然是道家极为重要的人物，然而，我国汉代最著名的史学典籍《史记》，却只字未提到列子。司马迁不提列子，证明史学家的谨慎，证明史学家已经怀疑列子的有无。

其二，在《庄子》一书中有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天下》，也没有提到列子。为什么在评述各学术流派时，庄周恰恰把列子忽略了呢？荀子的《非十二子》，列举先秦学术流派中十二人，同样没有提到列子，这些都说明列子的存在值得怀疑。

其三，西汉著名文人刘向，曾为《列子》作序，称“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繆公同时，盖有道者也”。一句“与郑繆公同时”，引来许多非议。唐代柳宗元首先指出其时代的错讹，认为刘向宏博精审，错讹不可能发生，只因列子无考所致。而且，在《列子》一书中，还有“杀子阳”之言。若如此，列子与郑子阳同时。子阳被杀，时在周安王（姬骄）四年

(公元前398年)。但是,书中又言公孙龙之事。公孙龙出生于子阳后百余年。书中又言宋康王事,宋康王又后于公孙龙十多年。列子当然不可能知道公孙龙和宋康王之事,而《列子》却写了,可见列子其人的存在值得怀疑。

列子是否确有其人呢?

列子确有其人,而且是先秦道家学派的重要人物。其理由如下:

虽然《史记》《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等重要书籍和文章未提列子,但是,在《吕氏春秋》一书中却提到,而且有精要的评述:

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臆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

——《审分览·不二》

“子列子”即为列子。在《吕氏春秋》中是肯定列子存在的。《吕氏春秋》内容之可信,已为学术界所肯定。而且“子列子贵虚”一句,恰到好处地指出了列子学术思想的精髓,这又证明,《不二》篇的作者,看到过或听闻过、学习过或研讨过列子的思想和论著,要不然是不能凭空概括出这么重要的观点的。

《战国策》上亦载有关于列子的情况:

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

——《韩策·史疾为韩使楚》

《战国策》记载战国时期各国策士的言行,西汉时经刘向进行整理,其中虽有策士辩人游说时的浮华夸饰之词,但基本上是一部信史。《韩策》所载列子事,与《吕氏春秋》对列子的评价接近。

《庄子》中的《天下篇》虽不单独提列子,但是全书若干篇章都记述了列子的行迹、性格和思想,有的固然是寓言,如《逍遥游》,有的却是客观记载,如《应帝王》《让王》;寓言描述的情形,可视为虚拟和假托,而客观记载的行历,尤其是“内篇”的记载则无可怀疑。

持论较为慎重的《四库提要》则说:“当时实有列子,非庄周之寓

名。”又，《四库提要》据《尔雅疏》引《尸子·广泽篇》曰：“墨子贵廉，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所引《尸子》语，正与《吕氏春秋》对列子的评述相同。

此外，班固的《汉书》在《艺文志》中，载有“列子八篇”；唐人颜师古注：“名圉寇，先庄子，庄子称之。”班固所指的“列子”，显然指的是其人，与“老子”、“关尹子”相并称，这说明列子之存在无可怀疑。颜师古据史料注列子，亦可相信。

据此可以断言，列子决非“列缺、鸿蒙”之属，而是实有其人。

列子生活于什么时代？根据《庄子》的记载，列子曾问道于关尹，那么至少与关尹同时或稍晚。而关尹又师老子，关尹与老子同时或稍晚。《史记》说：老子“与孔子同时”。这样一推测，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这正是春秋末，只差3年进入战国时期。可知，列子当活动于春秋末到战国初期，下限至多到周安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76年）。又据《吕氏春秋》：“子列子常射中矣，请之于关尹子。”说的仍与关尹子同时，即春秋末到战国初。这是推测列子活动时期的又一有力的佐证。

既然列子实有其人，又确实活动在春秋末至战国初期，为什么《史记》《庄子·天下》和《荀子·非十二子》等不记载呢？

这原因不难理解。

就《史记》而言，司马迁显然读过《吕氏春秋》，因为司马迁曾为《吕氏春秋》的组织者编纂者吕不韦作过传，即《吕不韦列传》。对于该书编纂、写作的过程，基本内容和大旨，成书后的情况，司马迁都是知道的，这就是说，作为先秦道家的重要人物列子，司马迁同样是知道的，虽不记载，但也未曾在《史记》的任何一篇中否定过；同时也说明，不载列子，并非司马迁的疏忽，只能认为是司马迁明知而有意不载。之所以会如此，或者由于司马迁没有搜集到列子更确凿更完备的材料，以致未加传述；或者由于在《史记》中对老子和庄子已经列传，只让道家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出现即可，因而不专述列子；再有，司马迁主要活动期为汉武帝刘彻的时代，这时社会上独尊儒术，对于西汉初年倡行的黄老（黄帝、老子）之学已经势力大减，几至学术界较少提及，加之司马迁时以及西汉初，人们没有或极少称引列子，因而司马迁不为列子作传也就可以理解了。

何以庄、荀的重要篇章也不提列子呢?《庄子》一书提到列子(称“子列子”、“列子”、“御寇”)达 10 多次,而唯独《天下》不提,则有以下原因:首先,《天下篇》经学术界认定,为庄子后学所附益,非庄子本人之观点,所以对于学派代表人物的取舍,已与庄子本意不谋;其次,对于学派代表人物只取主要的,认为不是最主要的则不取,即使不提列子,文中提到了关尹、老子,又有专段提庄子(这是后学附益的根据之一),有了三个代表人物也就够了,事实上,《天下篇》对于每派代表人物也至多提三人,少则提二人,这样写体例上是一致的,不提列子也并不奇怪;再次,不提列子,并不说明《庄子》一书否定列子的存在、事迹和观点,正如《天下篇》未提孔子,也不说明对孔子的否定。

荀子的《非十二子》中未提到列子就更不足为怪了。其一,它是非难它嚣、魏牟、陈仲、史鳢、墨翟、宋钲、慎到、田骈、施惠、邓析、子思、孟子等十二子,并非对任何人都要指责一番,其中的孔子、老子、庄子等人就没有列入被非难之人里面。其二,对于学术流派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对其代表人物可以有取舍的不同标准,不能用某一观点强求荀子只能提这个,不能提那个,正如不能强求《天下篇》一定还要提管子、商鞅等人一样,所以荀子不提列子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三,不提某某,同样不意味着此人不存在;列子是存在过的,只不过荀子不把他同道家一齐加以非难罢了。

《列子》的真伪

关于《列子》的真伪,历来是学术界聚讼不休的问题。

《列子》这一书名,先秦时代典籍所未见,直到东汉初的班固(公元 32—92 年)修撰《汉书》,才在《艺文志》中载有仅 4 字的一个条目——“列子八篇”。“列子”系指称其人,“八篇”系指称其文。这证明,信史所载列子者有八篇文章,是确凿无疑的,而《列子》一书千真万确曾流行于世。

在班固之前,西汉晚期的刘向(约公元前 77—公元前 6 年),曾对《列子》一书加以整理编纂,取名为《列子书录》,共八章(即今所见八章篇名)。成书时间为汉成帝永始三年(公元前 14 年)八月壬寅。这是最早对《列子》一书的记载。在《列子书录》中还有刘向写的一篇“序”。其中写道:“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参,

人名)校讎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新书有栈(意为虫蛀断灭),校讎从中书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云云。“序”里记载成书过程,似可相信。但是,不少学者却认为刘向的所谓《列子书录》以及“序”均为伪造,实不可信。

至晋代,出现一个张湛,并著有《列子注》一书,即今刊行于世的《列子》通行本。对于《列子注》为张湛所著无人怀疑;人们怀疑这本《列子》是否可靠,许多学者认定张湛注的《列子》为贋品,绝非先秦列子所撰之真品,也绝非刘向、班固所见到或经整理过的书稿。

《列子》一书,绝非先秦之列子所撰,这在学术界已成为定论。

证明《列子》非列子所撰的主要根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甲,西汉刘向的“序”就已经提出了疑问。

乙,唐代柳宗元在《辨列子》一文中曾明确指出“其书亦多增窜非其实”。

丙,宋代黄震认为“其书八篇,虽与刘向校讎之数合,实则典午氏渡江后方杂出于诸家”(《东发日钞》)。所谓“典午氏”即司马氏,晋之司马昭;“渡江”指统一中国。就是说,《列子》是在晋王朝建立以后出现的,尽管篇目与刘向校讎的相符合,已非刘向时的原著。

丁,明代宋濂在其《诸子辨》中断言:“书本黄、老言,决非御寇所自著,必后人会粹而成者。”

戊,清代姚鼐在《惜抱轩文后集·跋列子》一文中提出“《列子》皆非尽本书,有后人所附益”。

己,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谈到《列子》之伪时说:“今考第五卷《汤问篇》中并有邹衍吹律事,……其不出御寇之手更无疑义。”又说:“凡称子某子者,乃弟子之称师,非所自称,此书皆称子列子,则决为传其学者所追记,非御寇自著。”

庚,清代梁启超说:“按理列御寇乃庄周前辈,其学说当然不带后代色彩,但《列子》中多两晋间之佛教思想,并杂以佛家神话,显系后人伪托无疑。”

辛,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举出《列子》最不可信的重要依据是“杨朱大概不及见梁称王”。时间上的差错,证明《列子》系

后人撰著。

壬,马叙伦在《列子伪书考》中,列举二十条理由,证明《列子》为伪书。

癸,杨伯峻《列子著述年代考》一文,从汉语史的角度鉴别《列子》成书的年代,断言“《列子》是魏晋人的贋品”。

此外,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补充《列子》为伪托的几条证据,确认《列子》为西晋中期作品。

以上仅是其有代表性的辨伪观点和根据。据此可以认定,《列子》确系贋品,决非列子所自著,也决非先秦时代列子之徒所记述。虽然是贋品,却又并非完全作伪,仍然保留了相当部分列子的思想和春秋战国时杨朱学派的思想,这是十分可贵的。作伪者是谁?出于什么时代呢?有的学者认为作伪人就是注释《列子》的张湛。这个论断,不敢苟同。张湛的《列子序》是可信的。他在整理断简残帙的时候,不可能不加入自己的观点,不可能没有他的编次体系。张湛在注释中不止一次地指出《列子》中的矛盾、失实、不明、重复和诬贤的地方,倘若是他自己作伪,何以要这样做呢?我认为,作伪者,可能是西晋中期,善于清谈、崇尚黄老、兼容各家、葆有玄风、放荡形骸的知识分子;究竟是谁,却无从确考。仅从内容和语句等方面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其思想乃汉末或晋代清议、玄风煽起时的知识分子所独有。书中广采博收,许多地方写得楚楚动人,且观点明快、文采朴质、风格统一,非一般学者所能为,乃饱览群书、融通古今、笔墨酣畅之士才能写得出。尽管《列子》是贋品,却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它的一系列寓言、故事特别精美,甚至在语言表达的某些方面超过《庄子》,有着较强的艺术魅力,因此,人们不愿抛弃它,并进而阅读、研究它,以致成为近两千年来传世的不朽著作。

《列子》的学术价值

《列子》是一部学术著作。

这部著作曾经显赫一时,并直接为封建帝王所推崇。西汉刘向说过,汉景帝刘启之时,贵黄老之术,《列子》“颇行于世”。因为《列子》的哲学思想,正是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于刘汉王朝的巩固有实际意义,于是《列子》在孝景时“颇行于世”,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怀

疑的。到了李唐王朝,高宗乾封二年(公元667年),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以老子姓“李”,同李氏一族而引以为荣。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置崇玄学于玄元庙,习诵《老子》《庄子》《文子》《列子》(号称“四玄”),并于天宝元年(公元741年)追封《列子》为“冲虚真经”。《列子》被抬举到空前的地位。宋代也曾倡行道家哲学。宋真宗赵恒,在“冲虚”二字下再加“至德”二字,名为“冲虚至德真经”。徽宗赵佶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立道学,诏太学辟雍,置《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并以《内经》和《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和《列子》为小经。唐宋时,《列子》尽管受其崇敬,但它的哲学思想,却被封建统治阶级曲解、利用了,被披上神学迷信的外衣,褻读了它的质朴和纯洁。现在是应该廓清并让其学术思想取得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时候了。

《列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对老庄学派的继承和发展

老庄学派对我国的哲学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发展到汉末魏晋时期,出现伪《列子》一书,从道家学派的哲学观来看,则是老庄学派的直接继承。

《列子》的宇宙观,完全建立在老庄哲学的基础上,同时又吸收汉魏各家的观点,综合成自己的宇宙观。

首先,《列子》坚持“道”是万物始祖,又是实体事物的朴素唯物观点。在《天瑞》中,明确地说,“道”就是“天地之根”;它产生万物,它自己却不生不化,其功能是“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这“天地之根”,同老子所说的“天地之母”是一个概念,相等的涵义。“道”,是实体物质,虽然它被视为玄而又玄的东西,但是它却是“气”所形成,天地万物均“积气之成”。这与庄子的“道气”说完全一致。这可见《列子》对《老子》和《庄子》继承的主导方面。

其次,《列子》吸取了《周易》中的某些观点,提出宇宙生成和发展的阶段论。《周易·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道”的变化发展阶段。《列子》坚持这种发展阶段论,却不生硬套用,而是提出了新颖的见解。《天瑞》说:“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从“太素”以后,物质世界便开始形成。有了物质世界,宇宙仍然发展,“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

《列子》比老庄进一步揭示这几个发展变化阶段,均由阴阳制约,各阶段互不孤立,是“未相离”而有着内在联系的。

再其次,《列子》还吸取了魏晋时人王弼等关于宇宙本体论的思想成果,以自己的见解,加入到玄学的论辩之中,把各家学说熔为一炉,而成为一种创新的见解。

此外,《列子》还提出关于物的先后巨细长短、物存在的形态、物的增减、时间空间有无极限等带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列子》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基本上立足于老庄学说,同时也融合了其它学派的一些观点,显得新颖而有意义。许多见解,在《列子》以前很少看到,这不能不说是老庄哲学思想的一个发展。

二、在魏晋哲学史上,《列子》是整个玄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东汉后期兴起士人的清议之风,品题人物,发表政见,议论朝政,士人以此为清高,乐于清议,甚至结为小团体。这种清议,往往与黄老、佛释相结合,或者说是用道、释的一些观点来议论时事,品评人物,逐渐地走向“玄”的道路。加之东汉晚期两次“党锢之祸”的沉重打击,使相当一部分士人不再敢于大胆议论时政和人物,便把自己的不满和愤激,用老庄思想包裹起来,埋头去探讨“三玄”(《黄帝内经》《老子》《庄子》)哲学,表达自己对宇宙生成、物质本体、自然人等的基本观点,这就形成魏晋时期玄风炽烈的局面。而《列子》一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出来,并加入了“玄言”的时代大合唱。

按照笔者的观点,《列子》一书写成于西晋中叶以前。从成书的时代说,《列子》是从何晏、王弼“贵无”论发展到郭象“独化”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列子》学说的建立,并没有抛开以前的思想成果,它是善于吸取思想养料,综合融化,建构自己思想殿堂而著称的。而《列子》的哲学大厦,就正是建立在“贵无”的基础之上。《天瑞》一再强调的“未尝终”、“未尝有”、“未尝发”、“未尝显”,显示的就是“无”的情形;而“无不知”、“无不能”,强调的则是“无”的功用,它能产生一切、制约一切,这就是“贵无”的基本观点。但是,《列子》并未到此为止,它还吸收了“独化”论的思想,变为自己的哲学观点。认为万事万物可以自由地生,自由地化,受一种盲目的自然规律所支配,任何人力都无法抗御。《力命》中说的“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自生自死,自厚自薄”等等,都是“独化”的表述。这样,《列

子》便从天道到人事、从宇宙观到社会观,展开它的思辨玄理,成为魏晋玄学发展第三阶段“独化”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独特的社会人生观,较为完善的社会人生理论体系

《列子》的社会人生观,仍然有承袭老庄、何王的一面。老子的政治观是“无为而无不为”。王弼指出,这就是“崇本以息末”(《老子注》)的表现。全部《列子》的政治观,完全是老子、王弼政治观的翻版。

这种政治观的思想内涵是“无为而治”,但是根本问题在于“怎样”无为,方能达到大治的目的。这里,《列子》确定了以君王、圣贤为核心,由他们施以“无为而无不为”的措施来实现治国与治民。

在人生观方面,《列子》取阮籍、嵇康等人放达肆情的态度,对礼义名教,基本上加以嘲弄和否定。

《列子》的人生观,在学术界引起最大非议的是《杨朱》一篇。认为《杨朱》反映了魏晋封建门阀士族的荒淫无耻的生活方式,露骨地宣扬腐朽的纵欲享乐思想,是一剂腐蚀人们心灵的毒药。

这个观点有其正确的方面,也有其偏颇的方面。说它正确,因为《杨朱》宣扬的就是纵欲和享乐,教人们不要“苦其身,焦其心”,“徒失当年之至乐,不能自肆于一时”。说它有偏颇,是因为对《杨朱》乃至对整部《列子》尚未作全面具体地研究,未能深刻说明它的享乐纵欲与魏晋门阀士族的淫乐虽有相同之处,却又有很大差别,这就是它独特的人生观和理论体系之所在。

《杨朱》宣扬的享乐主义,有一条明显的思想线索——任其自然。这是有积极意义的。首先,是继阮籍、嵇康之后,举起的又一面反名教、反传统的旗帜。《列子》的作者大约属于不得志的士子,面对着“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刘毅《疏》)的现实,加之连年的残酷战争,关中连年的饥荒,士人朝不保夕,便只好任性而为,反对人为的束缚和压迫。这种与封建当权者不合作,反对礼教传统的思想,其积极意义也就十分明显。其次,享乐和纵情的人生态度,核心是“为我”。这直接同魏晋时期的宗法制度,同道德仁义的说教相对抗,让人们重视自身,维护个人利益,尊重独立人格,这已经是人的初步觉醒时期的人生态度和理论形态,无疑地有着历史积极意义。再其次,是保护心灵的健康、纯洁而坚持的人生态度。《杨朱》宣扬的享乐纵欲,是以

“全性保真”为前提的。只有这样做,才是个人修养的根本,是善于“治内者”;只有这样做,才是“不违自然之所好”,因而也就没有任何牵累;只有这样做,才是真情而不是“矫情”,心灵不受闭塞,不掺杂质。《杨朱》也并不主张纵欲无度,并没有达到荒淫无耻的程度。它明确地指出,“无厌之性,阴阳之蠹也。”贪得无厌,逸乐失度,就走向反面,成为害人虫了。

《列子》的寓言艺术

《列子》不仅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寓言故事也有着较高的艺术水准。

整部书,共有寓言故事 102 个,可谓丰富多采。这里,有表达理想追求的,如《终北之国》等;有说明深刻哲理的,如《愚公移山》等;有讲养身治世的,如《黄帝神游》等;有反映高超技艺的,如《偃师造人》等;有探索自然奥秘的,如《两小儿辩日》等;有论证符验的,如《黑牛生白犊》等;有神灵幻象的,如《西极化人》等;有讽刺批判现实的,如《华子病忘》等;有生活小趣闻的,如《齐人攫金》等;还有其他一些难以归类的寓言故事。有的寓言故事,可以说是《列子》的杰出作品,影响极其深远,如《愚公移山》;有的寓言故事发人深省,意味隽永,如《景公游牛山》等;有的表现技艺精微,顿觉艺无止境,如《纪昌学射》等。但是,有的寓言故事也平淡无奇,仅仅是一般的说教,如《力命相辩》;还有一些寓言故事,或者照抄以前的书籍,或者只作适当改写,或者掐头去尾为我所用。不过,从总体上说,《列子》的寓言故事是有其创造性,有其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在我国寓言故事发展过程中是有其重要地位的。

一、高度的创造性,把寓言故事形式推向精美的发展阶段

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寓言故事,无疑地是指《愚公移山》《杞人忧天》等。为什么这样说呢?其一,体现了真理的美。寓言故事固然有许多方面令人赞美,但是它的真理光辉却是美的核心和本质。《愚公移山》,表达了劳动者坚韧不拔、矢志不移、团结胜利的崇高品德,读了以后让人精神振奋。《杞人忧天》,则表现人们探索宇宙奥秘、追求真理的美好情操,让读者理解远古时候人们就已经在建立朴素的唯物的宇宙观了。其实杞人不应该是被讽刺的对象,恰好是大胆设疑,勇于

求知的人物。其二,有一个矛盾展开和获释的过程。矛盾处于对立状态:愚公与自然的对立,愚公与智叟的对立,忧者与晓者的对立,人与宇宙的对立等,对立面的双方经过一定的发展过程,开始转化,并导致满意的结果。这正是辩证法的美的形象表达。其三,有着完整的情节,有着合理的结构布局,有着独立的寓意深刻的哲理内容。这样的寓言故事,几乎可以成为脱离《列子》的母体而独立成篇,使寓言故事走向更加完整和成熟,成为有别于其他文章体裁的样式。这对于先秦两汉魏晋的寓言故事多为设喻、警诫、不离母体来说,无疑是更富于创造精神的。

二、既有积极的浪漫精神,又有强烈的现实精神

它的浪漫精神,不仅吸取先秦两汉典籍中关于神话传说、幻想寓言的养料,而且有其独立的人格力量,有其超越现实的理想追求,有其瑰丽奇谲的想象和夸张。《黄帝梦游华胥国》,这当然是从远古神话传说演变而来的,但是却展示了与远古神话传说不同的品格,主要的就表现在塑造了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力量的黄帝形象。他已经不同于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乃是灌注道家思想,以道家法则治国的“黄老”典型了。他摆脱了现实给予的烦恼和憔悴,而以自己的行动超越于现实,完成了自己独立的理想追求。这样的人物,是想象的夸张的,也是美好的理想的。其浪漫精神就这样体现出来。

同时,《列子》寓言故事又是现实的,不少是对现实的虚构和概括,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逢氏之子病迷》与《华子病忘》有异曲同工之妙。后篇利用寓言最需要警诫之语的特殊形式,以老聃的一番言论,广泛而深刻地概括出当时社会现实的极端不合理。人们患迷惘症,这已让人觉得痛惜了;然而,迷惘症却能让人摆脱烦恼,减去痛苦,这更令人心酸、惊讶。不仅一人患迷惘症,几乎一乡、一国、普天下的人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患有迷惘症,这是世界的最大不幸。更有甚者,不能医治,因为医治者比患者更加迷惘,说明社会已不能根治,坏到了极点,这更使人产生无限的悲痛。不是一人的悲剧,是天下的悲剧。作者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何等清醒,又何等深刻!

积极的浪漫精神与强烈的现实精神,在《列子》中是结合的交融的,这成为《列子》寓言故事的又一成就和特色。

三、塑造了“列子”自我形象,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